

近代中国史话



近代中国史话

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近代中国史话》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近代中国史话

Jindai Zhongguo Shihua

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编写组
《近代中国史话》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73,000 字

197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2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1 186,500

书号 11001·336 定价 0.81 元

修 订 说 明

本书第一版于 1977 年 12 月发行。参加第一版书稿撰写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永康、石振刚、刘湘雅、李灼钿、林增平、彭祖珍等。最后由林增平统稿。

这次修订，将原五十三节删为四十节。负责修订的是林增平。

书中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敬希批评指正。

1983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侵略引起了反抗	1
(一)“通商”还是侵略?	3
(二)虎门销烟	9
(三)广州城头号角咽,三元里前声若雷	15
(四)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5
(五)“积患”何由去? 风雷何处行?	31
(六)金田起义,天京定都	36
(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45
(八)北伐旌旗,西征鼓角	50
(九)由盛变衰的转折	57
(十)力求振作,再争上游	62
(十一)中外反动派的勾结	68
(十二)痛击洋枪队,勇抗侵略军	76
(十三)未酬灭妖志,英烈殉天京	83
(十四)披霜踏雪,高庄凯歌	87
第二章 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93
(十五)半殖民地化的几轴画卷	94
(十六)火烧望海楼	101
(十七)沙俄的“睦谊”是什么货色?	107
(十八)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113
(十九)洋务运动的破产	119
(二十)颐园歌舞,黄海波涛	124
(二十一)誓死抵抗,保卫台湾	131

(二十二)蚕食鲸吞,瓜分狂潮	137
(二十三)维新风气,盛极一时	145
(二十四)“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52
(二十五)“杀了袁鼉蛋,我们好吃饭”	159
(二十六)同八国联军喋血苦战	168
(二十七)“扫清灭洋”	176
第三章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	183
(二十八)“洋人的朝廷”	184
(二十九)革命先行者,一代擎旗人	190
(三十)《革命军》,《警世钟》	196
(三十一)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203
(三十二)萍水歌壮志,黄花慰英魂	209
(三十三)“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218
(三十四)武昌首义,全国响应	225
(三十五)“只把一个皇帝赶跑”	233
(三十六)为“建设完全民国”而斗争	242
(三十七)一枕黄粱皇帝梦	247
(三十八)短命的张勋复辟	253
(三十九)“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260
(四十)曙光在望	265
近代中国史事纪略	271

第 一 章

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祖国首都北京，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挺拔高耸，巍然壮观。纪念碑的北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30日题词、周恩来同志亲笔书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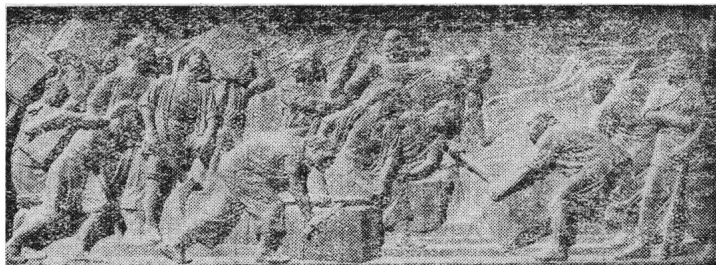
碑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国长远的历史上，1840年是一个明显的界标。从那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即1919年，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一般称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为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也可叫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当我们昂首诵读了碑文，视线下移时，纪念碑基座四周的大理石浮雕，就清晰地映入眼帘。那栩栩如生的人民英雄形象和斗争情景，是多么的扣人心弦，多么强烈地激发我们渴望

了解 1840 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以前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前辈英雄卓绝奋斗的艰苦历程啊！

纪念碑东面的两幅浮雕，一是虎门销烟，一是金田起义，象征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两大历史事件。这两大事件的起伏演变，以及围绕事件进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时期（1840—1864年）。

这个时期，是以资本主义英国带头发动侵华战争为开端。战争中；清朝（1644—1911年）统治者暴露了它的腐朽和对外妥协以求苟安的虚弱心理；而广大人民，则显示了不甘忍受外来民族压迫，坚决反抗殖民主义者入侵的顽强斗争精神。由



虎 门 销 烟



金 田 起 义

于清王朝的屈服，反抗侵略的战争失败了。中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具有殖民主义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

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祸患，战后封建统治的日趋昏聩和酷虐，激起了各族人民反抗浪潮的急剧高涨，到1851年，就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空前宏伟的农民大起义，坚持十四年，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于1864年失败，中国社会就加速被卷入半殖民地化的旋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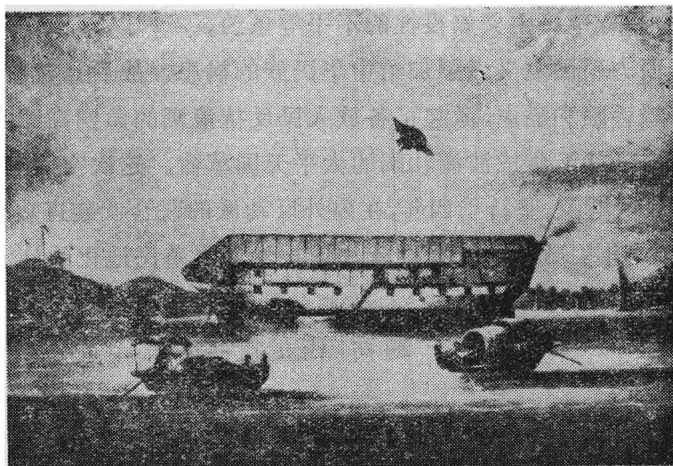
(一)“通商”还是侵略？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初冬。

广东珠江口外伶仃洋水面上，停泊着二十三、四艘囤积鸦片烟土及其他走私货物的外国趸船，另有两艘英国兵船在旁护卫。天还没亮，英商怡和洋行趸船的船舷边，紧靠着几艘叫做“快蟹”(也称“扒龙”)的快船。一蒲包一蒲包的烟土，从趸船卸到“快蟹”舱里。“货”一卸毕，每艘“快蟹”的两侧都伸出二十多支桨，扯起满帆，象箭一般地窜向虎门。

在虎门，一溜儿排着十多号清朝水师巡船。那些“快蟹”靠拢巡船后，一个武官带领十多个兵弁，挨次钻进各艘“快蟹”里查点一遍，就挥手放行。“快蟹”又一艘接一艘驶向广州。

专任缉私的巡船为什么让满载违禁毒品的“快蟹”畅行无阻呢？原因是巡船早已被内外鸦片烟贩收买过去了。这时，统领巡船的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更同烟贩订了一个契约，每私放一万箱鸦片进口，除了收取一笔贿赂外，还让巡船扣下几



伶仃洋上囤积鸦片的外国趸船

百箱，作为缉获的赃物，送到上司衙门去报功请赏。没多久，韩肇庆居然以“缉获鸦片”有“功”，晋升为总兵官。

这是当时鸦片走私一瞥。

鸦片在我国古代曾用作止泻、镇痛的药物；当做嗜好经常吸食，大约起于明朝中叶以后。一经吸食，即易成瘾，很难戒除，于是肌体消瘦，精神萎靡，成为废物，寿命短促。所以，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推行鸦片贸易，无异是从事一桩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

不能认为韩肇庆那样包庇鸦片走私是个别事件。他的卑鄙行径，反映了鸦片的毒素已经严重地侵蚀着清朝的统治机构。

鸦片战前，中国封建制度已日趋没落，久已桎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阻滞着社会的进步。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

朝，也日趋反动衰朽，整个统治集团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的习气。随着鸦片的输入，他们当中相当数量的贵族官僚，以至胥吏差弁，不仅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空虚荒淫的寄生生活，而且在内外烟贩各种方式的收买下，又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性质，从中牟利。鸦片主要走私口岸的广东，上自总督、巡抚和粤海关监督，下至差役兵丁，多数不同程度地和这种走私贸易联系在一起。朝廷上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的官吏那里获得比过去更为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因此收到大量的西洋奇珍贡品，成为此一“通商”关系中的受益者。所以，尽管清政府多次颁布过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禁令，却一直毫无成效；甚至每发布一次禁烟法令，包庇走私者更能够上下其手，获得更多的利益，鸦片输入数量，又猛增一次。

1767年以前，鸦片输入中国每年一般未超过二百箱，到1838年，便迅增至四万箱。烟毒祸害，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二

当时经营鸦片贸易的主要是英国商人。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走私销售的烟土，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占领下的印度孟加拉。美国商人则从土耳其和波斯贩运鸦片，输入中国。

在广州的英国商行，没有一家不和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怡和洋行是几家大鸦片商号中的一家，它是一个叫威廉·查顿和一个叫詹姆斯·马地臣的大烟贩合伙开设的。在中国人民眼里，这是两个卑污狰狞的吸血鬼，广州群众还给查顿起了个“铁头老鼠”的浑名。可是，英国资产阶级却把他们捧作英

雄。1836年，在英国利物浦港建造的一艘新式快船，就以查顿的名字命名。马地臣满载金银财宝回国后，也很快显贵起来，当上了英国下议院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后来还获得皇家学会会员的桂冠，成了英国上层名流里的头面人物。

肮脏贪婪的走私烟贩，为什么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如此的煊赫尊贵呢？这得从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去进行考察。

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正处于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工业革命走向“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英国殖民者一方面仍然沿袭原始积累阶段那种海盗式的侵略活动，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干着杀人越货、贩卖奴隶、贩运鸦片等极其野蛮的掠夺勾当，继续增殖发展本国工商业的资金；另一方面则贪婪地寻求扩大推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以攫取超额利润。由于英国最先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又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掠夺手段，并伴随着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因此，到十九世纪，英国就成了在世界五大洲都拥有殖民地的头号强国。所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取财富，是不择手段的。

这时，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到达没落的阶段，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发展，可是，在这个社会里占主要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却具有相当顽强的抵制作用。同时，清政府又一直采取限制中外贸易的“闭关”政策，规定除广州一处外，沿海所有口岸，不许任何外国船只进出贸易。这样，英国及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达到它们所预期的向中国倾销工业商品、牟

取暴利的目的。于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输出商品、掠夺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鸦片走私就更加猖獗起来。

特别要提到的是，基于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在东方商务的特殊情况，对华鸦片贸易尤显出它的重要地位。那时，英国对东方贸易大体是按如下程序进行的：从英国本土出发的商船，把棉纺织品运进印度倾销，获得利润，再从印度载运鸦片向中国走私，赚得大量的金银，然后又把一部分赚来的金银贩运中国的茶叶和蚕丝等，到本国和欧洲出售。如此循环往复，惊人的利润和税款，就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财库——经营鸦片的烟贩，得到50%左右的血腥利润是常有的事；享有在印度制造和出售鸦片专利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经常以超出成本八、九倍的价格出售鸦片，除了以约相当于售价的1/3作为税款上缴外，其余部分就是它的纯收入；英属印度政府从鸦片买卖所征收的税款，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英国纺织资本集团，则依赖印度生产和输出鸦片来购买棉纺织品；而从中国贩进茶叶和蚕丝等，又使英国海关得以征收大宗关税。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获得利润的多寡，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鸦片贸易的盛衰为转移。这桩买卖一中断，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超额利润和财政收入，就会显著下降。所以，鸦片走私在英国资产阶级对东方殖民主义贸易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难想见的。

三

鸦片战争前十年间，英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迅速的进展，对华鸦片贸易也堪称盛极一时。因此，期待中国市场对它的

工业品和鸦片都大大开放的心情，异常迫切。于是，这个惯于用炮舰去轰开别人门户的“海上霸王”，也准备对中国下手了。一份所谓“阿美士德号”1832年的航行记录，确凿地证实了英国侵华战争是早已预谋的。

“阿美士德号”是英国在东方从事殖民主义活动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派遣的一艘船，船主化名胡夏米；给胡夏米当谋士的是一个叫做郭士立的传教士。它从澳门启航，每到一处，胡夏米就向当地清朝官吏递上一份“说帖”，要求开放通商。同时，暗地里却分派船上人员去测量航道，兜售货物，刺探各种情况。请看它启航后驶达第一个寄碇港口的记录吧：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于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五千二百三十七人，……海港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胡夏米一行也象在南澳一样非法逗留，对当地的形势、航道、炮台、兵员、物产，一一进行窥探，测绘，并作了详细的记载。

这份航行记录最后写道：

“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而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

三年后，胡夏米又给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写了一封信，反复叫嚷对中国“动用武力成为必要手段”，并拟订了发动侵华战争的详尽方案，包括所需船舰、大炮、兵员的配备，所应采取的战略部署，以及发动战争最为适宜的季节，等等。到

1839年，英国“伦敦的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同印度、中国有关的工业、金融资本家和鸦片贩子集结的一个团体，又把胡夏米所拟订的方案作蓝本，向政府上书献策，鼓动战争，理由据说是，中国不给他们“通商”的“平等待遇”。

正是在这种虚构的要求“平等待遇”的幌子下，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不义的战争，把鸦片贸易、带有殖民主义奴役性质的“通商”关系强加给中国。

（二）虎门销烟

—

鸦片烟毒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泛滥成灾，沉渣浊水，浮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怪现象。

从沿海直至内地的大小城镇，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象毒菌似的孳长起来。掀起每个烟馆的门帘朝内一望，但见烟雾弥漫，一些面如死灰的吸毒者，横卧榻上，手握烟枪，对着一盏鬼火似的烟灯，双肩耸起，吱吱地狂吸着。由于吸毒者一般都是晚间过瘾，长夜不眠，白日昏睡，过着日夜颠倒，糜烂无聊的生涯，因而群众称他们为“大烟鬼”。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圩集，十几二十家店铺里，烟馆常占半数左右。白天，象夜间那样寂静，黄昏以后，却家家灯火，处处乌烟瘴气。广大群众对此极端厌恶。爱国人士不禁深为慨叹，感到长此下去，中国就可能落到“人世将尽，鬼市已成”的地步。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威胁啊！

在烟馆里出入的多半还是地痞土棍，差役市侩，至于贵族

达官、豪门富室的烟鬼们，就阔绰得多，真是“侯门朱户翠帘帘，煎膏（将烟土煎成烟膏以备吸食）日夜烟熏天”，不知要耗费多少农民终年劳累的血汗。在清朝的军营里，人们可看到，一些兵弁随身带着两杆枪——一杆作武器的枪，枪尖生锈；一杆烟枪，却油光贼亮。

中国白花花的银子，淌水似地流到了伶仃洋的英国趸船上。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空前严重的“银荒”危机，市面上，产生了剧烈浮动的“银贵钱贱”的现象。

清朝时，社会上通用的主要货币是制钱——圆形，中间有一方孔的铜钱，每一枚称一文。十八世纪末，一两白银，兑换制钱约七、八百文。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入口陡升，白银外泻愈急，市面银价益昂，一两白银兑钱至一千七、八百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少量产品，只能换回铜钱，而向官府完粮纳税，则要折成银两交纳。商人乘制钱贬值哄抬物价。地主官僚因吸食鸦片，糜费更大，剥削愈加残酷。这样，烟毒泛滥所带来的一切灾害，最终都转嫁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禁绝鸦片。

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贵族大臣，终日昏昏，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心里盘算着鸦片走私给他们带来的享受和利益。他们是攀缘在鸦片走私网上的大小官吏、烟贩烟鬼们的总后台，外国侵略者在清王朝里的代理人。他们并不公开反对禁烟，反而需要借助查禁烟土的官样文章，维持鸦片“明禁暗运”的走私状况，以便获得厚利。1839年禁烟运动开展起来后，他们竭力抵制、破坏；在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他们是卖国求荣的投降派。

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少数权势较次，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吏和士绅，对于遭到鸦片腐蚀而加速衰败的清王朝，深为焦虑，看到烟毒弥漫所产生的祸害，也感到忧愤，因而希望能真正堵塞鸦片走私的渠道，有的还为此作过一番努力。在鸦片问题上，他们力主严禁；英国挑起战祸后，他们坚持抵抗。他们的主张和作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

1838年，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掌殿仪礼）黄爵滋上奏，建议在严厉查禁鸦片贩卖的同时，首先要重治吸食，办法是以一年为期，责令戒烟，期满后继续吸食者，平民处死刑，官更加等治罪。道光皇帝把这个奏折发交各省督（总督）、抚（巡抚），要他们“各抒所见”。于是，围绕这个奏折，清王朝内展开了一场论争。

清廷中央及各省督、抚中，反对黄爵滋奏议的占多数，其中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等权贵在内。琦善诬指黄爵滋提出的严禁措施是“欲兴大狱”，有伤“圣朝宽大”。他和多数反对者都主张按以往的“定例”不变，实际上是让鸦片走私照旧延续下去。

支持黄爵滋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林则徐（1785—1850年）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历任地方官，有清廉的声誉，肯实心任事，有革新倾向。他任湖广总督时，在两湖厉行禁烟，有相当成效。他在复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进一步剖析了“重治吸食为先”的必要性。他说，象俗话讲的，卖梳子的不会跑到和尚庙里去叫卖，果真禁绝了吸食，谁还会贩鸦片开烟馆呢？他又说，如果还不切实禁烟，长此以往，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想到这点，就不寒而栗。